

由撤回、駁回案件反思婚暴保護令之執行概況

沈慶鴻

家庭暴力防治法（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on law）（以下簡稱家暴法）自民國 87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實施後已超過六年，家暴法中的重要特色－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亦運作了一年餘。國內家庭暴力防治制度的運作，不僅創下了亞洲大陸法系國家的創舉，亦促成了政策制定由下而上、由民間再至政府的典範。

然而，保護令制度源自於英美法系的國家（如美國、澳洲等），有其複雜之人文、社會、教育和法治觀念等背景，此一境外移入的新制度雖在各界萬般期待下催生而成，然其是否適應本土的狀況，能否與國內家庭倫理觀念相配合（沈方維，1999a），執行過程是否遭遇困境，受虐婦女權益是否真能獲得維護和保障，實有必要進行持續性的評估與追蹤。

尤其近來要求家暴法修法的呼聲漸增，更被提醒應對家暴法的運作結果進行全面的體檢；國內現有評估保護令成效的相關研究和期刊目前雖正在累積中，然其評估的焦點多集中在保護令的聲請程序及核發結果，因此，為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本文則在參酌了法院保護令聲請案的相關資料後，擬由保護令被撤回、駁回的角度來思考保護令的執行狀況，以為關懷保護令運作者之參考。

家暴法的特色－保護令

過去婚姻暴力的婦女，一旦與配偶形成了暴力的互動關係後，其生活無異於陷入痛苦的深淵中，不僅求助無門，也註定了終身的苦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過為受虐婦女點亮了一盞明燈，而保護令制度的執行，更為受虐婦女敞開了希望的大門；其不僅將家庭內的暴力行為重新定義為犯罪行為，為向來「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提出挑戰，甚至也為違反保護令政策者提出罰則，如此突破性的做法不僅宣示了政府公權力正式的介入家庭，也為受虐婦女權益的保障和預防暴力的再發生做出努力（李仰欽，2001）。

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order of protection or protective order），係指法院為保護特定人使其免受侵擾、傳喚或發現真實（discovery）之命令或裁判；而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則係指法院為保護特定人免受家庭暴力之命令或裁判而言，且保護令通常係由民事庭法官所核發，故又稱為民事保護令（civil protection order）（高鳳仙，1996）。

茲以下列各項簡介說明保護令之內涵：

一、保護令的種類

依家暴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及暫時保護令兩種。但暫時保護令中，又有依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核發之暫時保護令及依同條第三項所核發之暫時保護令；由於後者係應有家庭暴力急迫危險之情形，需於四小時內核發，故又可稱之為緊急性暫時保護令，而前者即可相對稱之為一般性暫時保護令（沈方維，1999a），其內容如下：

（一）通常保護令：由法院以終局裁定所核發，包括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各款內容之保護令。

（二）暫時保護令：由法院於通常保護令聲請前，或於通常保護令聲請後法院審理終結前，以裁定所核發，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十二款內容之保護令（第十五條第二項），暫時保護令又分為：

1. 一般性暫時保護令：法院為保護被害人，得不經審理程序或於審理終結前，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聲請人書面聲請所核發之暫時保護令。

2. 緊急性暫時保護令：法院於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經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於任何時間聲請，除有正當事由外，應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之暫時保護令。

至於所謂「急迫危險」，宜考量被害人有無遭受相對人虐待、威嚇、傷害或其他身體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現時危險」，或如不核發暫時保護令，將導致發生「無法回復之損害」等情形決定之。

二、保護令之聲請人

依保護令之內涵可知，法院於家庭成

員間發生家庭暴力時，根據有聲請權人之聲請，經審理程序或不經審理程序，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各款內容，用以規範並調整相對人、被害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關係之命令（沈方維，1999a），而所謂之聲請權人，各保護令中亦有不同之界定。

（一）通常保護令及一般性暫時保護令之聲請權人是指：

1.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四條）。

2. 被害人為未成年人或經宣告禁治產之身心障礙者，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聲請；但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亦得為聲請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

3. 成年之被害人雖未經禁治產宣告，但屬身心障礙者，除其本人得為聲請人外，亦得由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為聲請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

4. 成年之被害人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亦得由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為聲請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至於何種情形謂之「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宜斟酌下列情形定之：被害人之身體狀況、被害人之精神狀況、被害人當時之處境。

（二）緊急性暫時保護令之聲請權人係指：檢察官、警察機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本法十一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條）。

茲以下表呈現通常及暫時保護令在聲請人、管轄法院、存續期間、救濟範圍、聲請和核發程序上的差別（王秋嵐，2001）：

我國保護令分類表

	通常保護令	一般性暫時保護令	緊急性暫時保護令
聲請人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
管轄法院	保護令之聲請由被害人、相對人之住所地或家庭暴力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存續期間	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為一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效前，當事人及被害人得聲請法院撤銷、變更或延長，延長期間為一年以下，並以一次為限。	暫時保護令自核發起生效，於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去效力；暫時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及被害人、相對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撤銷或變更。	
聲請程序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聲請應以書面為之。	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聲請應以書面為之。	緊急性暫時保護令必須在被害人有受婚姻暴力急迫危險時，由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聲請之。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但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聲請，並得於夜間或休息日為之。
法院核發程序	法院於保護令事件審理終結前，得聽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中的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	原聲請人如能證明有正當、合理之理由，足認被害人或其家人有受相對人虐待、威嚇、傷害或其他身體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危險，或如不核發暫時保護令，將導致無法回復之損害者，法院得依聲請，不通知相對人，或不經審理程序，於通常保護審理終結前，核發一般性暫時保護令。	法院於受理緊急性暫時保護令之聲請後，依警察人員到庭或電話陳述婚姻暴力事實，認為被害人有急迫危險者，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暫時保護令，並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暫時保護令予警察機關。
罰則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規定：違反法院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之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二、禁止直接或間接、騷擾、接觸、通話或其他連絡行為。 三、命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治療輔導。		

（資料來源：王秋蘭，2001）。

三、保護令之內容

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即明白陳述保護令的內容，而其中除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二款屬抽象、概括規定，供法官於核發時，針對具體個案之特別需要為最妥適之決定，以促進和諧、防止暴力、保護權益外，其餘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均具體規範保護令之內容，其內容如下：其中第一款至第四款係為防止暴力發生或擴大而規定，第五款至第九款為安定雙方及家庭成員生活所為親子關係及財產關係之暫時調整規定，第十款為使性格、精神或行為已有偏差之加害人得以獲得應有治療或輔導，協助矯治其性格、精神或行為，以利家庭和諧關係之重建為規定，第十一款則為填補被害人因尋求法律協助所花費財產為規定，各有其重要意義與作用（沈方維，1999b）。

茲以下表，呈現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中保護令各款內容、類型、保護令種類及執行單位的關係。

保護令之終結

保護令係法院於家庭成員間發生家庭暴力時，根據有聲請權人之聲請，經審理程序（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通常保護令及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暫時保護令）或不經審理程序（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暫時保護令），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十三條第二項之各款內容，用以規範並調整相對人、被害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關係之命令（沈方維，1999b）。

通常保護令在聲請後，法官即依其職權逕行必要之審理工作，若未經聲請人撤回，則通常保護令之審理終結，通常有三種情況（沈方維，1999a）：

類 型	說 明	暫時保 護令	通常保 護令	違反保 護令罪	執行 單位
限 制 令	第一款：禁止加害人再度施暴	※	※	※	警方
禁止接觸令	第二款：禁止加害人打電話、寫信或其他騷擾行為	※	※	※	警方
遷 出 令	第三款：命令加害人搬出住所	※	※	※	警方
遠 離 令	第四款：命令加害人遠離某些特定場所、特定距離	※	※	※	警方
暫時使用權	第五款：命令交出生活、工作及教育上必需用品	※	※		警方
暫時監護令	第六款：暫定子女的監護權	※	※		警方
暫時探視令	第七款：規定加害人探視子女方式或禁止探視		※		警方
給 付 令	第八款：命加害人負擔租金、扶養費	※	※	※	警方
	第九款：命加害人負擔醫療、輔導等費用				
	第十款：命加害人負擔律師費				
防 治 令	第十一款：命加害人接受戒癮、精神治療、心理輔導		※	※	警方
其它保護令	第十二款：其它措施	※	※		警方

說明：打※者，即表示其內容包含此令（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編印，1999）

一、**核發通常保護令**：法院認為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核發通常保護令（家暴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且法院在核發通常保護令時，應斟酌加害人之性格、行為特質、家庭暴力情緒之輕重、被害人受侵害情節之程度及其它一切情形，選擇一款或數款內容最妥適之保護令。

二、**駁回聲請**：法院認為並無家庭暴力之事實，或雖有家暴之事實，但無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時，應駁回保護令之聲請；駁回聲請時，應以裁定為之，並敘明理由。

「駁回」一詞，係民事裁判之用語，凡為不予准許之表示者即謂之「駁回」；亦即法院對於當事人之請求，認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而予以駁斥之謂。故法院對於訴（或上訴、再審之訴等）或其他之聲請、聲明、異議、請求（或抗告、再抗告等），認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而為否定之裁判者，均用駁回一詞以表示之；其駁回之方式除判決外，尚有裁定（民訴二二〇）。對於訴（或上訴、再審之訴等）之不合法而予以駁回，以裁定為之，因其無理由而予以駁回，則以判決為之（引自司法院網站）。

而原告之訴因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又未於法定期間內補正者，法院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表示：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請其補正（引自司法院網站）：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者。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者。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七）起訴違背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三、**不得核發暫時保護令**：暫時保護令係於通常保護令聲請前，或於通常保護令聲請後審理終結前，法院依聲請所核發非終局性保護令，如審理已終結，認有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必要時，自應核發具終局效力之通常保護令。

而除了法院的核發、駁回（駁回或不核發暫時保護令）外，保護令聲請後之終結情形，尚有「撤回」一項；而所謂的「撤回」，係指原告起訴後，向法院表示不就其請求之當否予以裁判之意思。由於民事訴訟本於當事人之辯論主義，起訴與否，既一任當事人之自由，故亦允許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若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因被告有得受本案判決以確定私權之利益，若允許原告任意撤回，即非保護被告之利益，故此時期，應得被告之同意後，始得撤回。因此，承上所述，所謂「撤回」，簡而言之即是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向法院表示撤回其訴之全部或一部，請求不為判決之意思表示，而訴經撤回者，即視同未起訴（引自司法院網站）。

故綜上所述，通常保護令之終結情況應包含：核發、駁回和撤回三類。核發及

駁回主要由法官依其職權決定，而撤回則依聲請人之意願決定。

保護令的聲請和終結概況

司法院統計處所公布之保護令統計資料，是國內保護令最重要和正式之資訊來源，以民國 88 年 6 月 24 日保護令正式運作日起，至民國 92 年 12 月底止，全國保護令之聲請案件已超過五萬件；而以最近的 92 年全年為例，共有 17,008 件、平均每月 1,417.3 件的新聲請案進入全省各地方法院，這個情形相較於民國 89 年 6 月保護令實施一週年時的平均每月 796.08 件的新聲請案而言，平均每月增加了將近一倍的新聲請案。

在民國 91 年共計 17,008 件（舊受件數為 1,256、新收件數為 15,752）的審查案件中，當年度即審理終結的案件有 15,943 件（93.73%），其中通常保護令 11,284 件（70.77%）、一般性暫時保護令 4,461 件（27.98%）和 198 件（1.24%）的緊急暫時保護令。

若依保護令審理的終結結果來看，民國 92 年的核發數為 10,157 件，核發率為 86.6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所宣稱此一超過八成五的核發率，是在扣除了撤回案件後，以總聲請量除以總核發量所計算的；但若以實際的總聲請數（包含了自行撤回件數）除以總核發數後，核發率立即下降至 63.7%；而由司法院統計處在進行核發與駁回比例的計算時，將撤回案件扣除的設計，可以看到司法系統認定撤回是聲請人的個人行為，並未去深究這將近 23% 的差異其可能形成的原因。

然而，縱然司法院統計處並未深思撤回案的可能意涵，不過民國 92 年保護令全年的撤回數，已將近全年終結案件 1/4 的事實卻不容忽視【有 3,814 件撤回，佔全年終結案件（15,943 件）的 23.92%】；且由婚暴防治機構服務受虐婦女工作者的實務經驗亦指出：被害人撤回案件的原因並非單純的「個人意願」，而是與被害人在聲請過程中與司法體系的互動經驗有關（周月清，2001；柯麗評，2000；李仰欽，2000；沈慶鴻，2003），且在撤回比例如此高及逐年緩步上升的情況下，實無排除而不予討論的道理。

此外，民國 92 年保護令聲請案的駁回數有 1,566 件，約佔全年終結數的十分之一（9.82%），此一數字與前幾年相較，雖並太大的變化；然而值得關心的則是駁回的理由及駁回對受虐婦女權益和處境的影響；應有必要就家暴防治的立場來思考如何減少被駁回的可能性的。

研究上的發現

一、研究資料的收集

基於上述對保護令執行成效上的關心及對保護令相關統計數字的好奇，本人於是在「聲請者撤回保護令的原因」及「法院駁回保護令的理由」上進行探究和討論；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係研究者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案「保護令制度之實施對臺北市受虐婦女處境影響之探討」之部分內容。本研究以資料抄錄的方式，收集臺北地方法院和士林地方法院自民國 88 年 6 月 24 日至 90 年 9 月 30 日止之已

終結的保護令聲請案為樣本範圍，樣本條件的設定如下：

(一)收集通常保護令之撤回和裁定駁回的案件。

(二)聲請者之戶籍或居住地為臺北市者。

(三)保護令聲請期間需自民國 88 年 6 月 24 起至 90 年 6 月底止，且在 9 月 30 日前已終結之聲請案。

(四)且需在調卷期間，保存於檔案室之案件（若因其他因素，如法官調卷、相對人抗告等，而未保存於檔案室內之終結聲請案，則不包括在內）。

在確定樣本條件後，研究者即於民國 90 年 11、12 月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在法院協助檔案閱卷下，即利用人工進行逐筆抄錄的工作，抄錄法官裁判書中駁回保護令的原因及通常保護令聲請者撤回聲請之理由；最後再以質化研究之紮根理論進行抄錄內容之歸納和分析工作。

二、研究資料的呈現

在研究期間內，共收集到的 425 件（筆）之保護終結案，其中核發保護令的有 325 件、駁回 51 件、撤回 49 件；聲請資料最多的是民國 88 年（63.1%），其次為 89 年（32.5%）；聲請月份以 7 月～9 月（37.9%）占最多，4 月～6 月最少（14.6%）；若以不同地點計算法官裁定保護令的案件量，則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臺北地方法院主要集中在三個法官上，而士林地方法院法官的保護令裁定量則呈現分散和平均的狀況；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差異，研究者認為主要是因為在資料收集期間臺

北地方法院已有專屬保護令審理的家事法庭，故案件主要集中在家事法庭之法官上，士林地方法院當時無家事法庭的設置，故以輪流派案的方式進行，因此案件的審理呈現分散的現象。

三、法院駁回保護令之理由

所謂「駁回」，即含「不予准許」之意；即法院對於當事人所請，認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而予以駁斥之謂。在研究者所收集的 51 件駁回案中，研究者共歸納臺北地方法院和士林地方法院駁回保護令聲請者的八項理由，其內涵如下：

(一)未依規定繳納費用【包括聲請費、送達費 10 份（每份 34 元）、郵資等，其中包括已知需繳費而未繳，或因未註明通訊地址，以致繳費通知無法送達，而未繳費】。

(二)聲請書中未載明具體之事實（未載明聲請意旨、原因、事實及所附之證據）。

(三)無優勢證據，以證明有繼續施暴之可能。

(四)在期限內未能補正相關資料（其中亦包括因未註明通訊地址，以致無法送達補正通知，而未補正）。

(五)已離婚、已分居、已離家、或無再發生之事實，故無核發之必要。

(六)法律不溯既往（暴力行為發生在民事保護令實施前）。

(七)雙方互毆，無法證明相對人施暴行為，且聲請人隱瞞暴力行為。

(八)未能舉證為長期之暴力行為。

四、聲請人撤回保護令之理由

在研究者所收集的 49 件撤回案中，研究者發現多數的保護令案件聲請人在撤回聲請時，多數未說明理由，只寫出「撤回」兩字，因此研究者實在無法由其撤回狀中了解其聲請後又撤回的原因；而下述所歸納出的八項研究發現，則係研究者整理自部分有陳述理由之撤回狀中，其內涵如下：

- (一)未註明撤回理由。
- (二)撤回原聲請狀，改為聲請通常保護令。
- (三)已協議離婚。
- (四)已和解（願意給相對人改過的機會、誤會冰釋）。
- (五)相對人已搬出。
- (六)相對人未再動手。
- (七)相對人服刑中。
- (八)因為保護令的審理將傳訊子女，怕配偶報仇，故撤回。

不論駁回或撤回，上述之各項原因並非互相獨立或單一存在，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單一理由即被駁回，也可能是多重因素導致而成。

研究結果討論

瞭解保護令聲請後被法院駁回及聲請後又遭聲請人自行撤回的原因，是本文的主旨。基本上，我們假定所有的保護令聲請案都是在有必要的狀況下，才著手進行各項聲請動作的，那麼究竟是什麼理由，讓這些聲請案在未經實質審理的過程即遭法院駁回，或是在未經法院裁定即逕行採取撤回的動作，就聲請人權益的保護和處

境的影響，應是值得評估的工作。

由前述整理自法官裁定書中一裁定理由之資料看來，法官駁回聲請者之保護令聲請，占比例較高的原因，居然是因為聲請者未繳交足夠的費用（聲請費、裁定費或郵資）；因未繳 135 元（或以上）的聲請費，或每份 34 元、共 10 份的郵資而被駁回的這個現象實在是讓人無法想像，也覺得可惜。

此一結果的呈現，不免讓人疑惑「繳交費用」的這個問題，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是聲請者未被告知或不瞭解應繳交該筆費用？還是聲請者已知、但沒有能力繳交？抑或是有其他考量而不願繳交？研究者以為三百元以下的費用，應還不致於造成聲請者過大的負擔而形成無能力繳交的困境，若聲請者真因為此一費用無法繳交而遭駁回，那麼為了實際的解決家暴問題，家暴防治的各單位可能就有必要針對此一費用的補助與否來進行思考了，不過，就常理推測，這個部分的可能性應該不高。

因此就這個問題，我們應思考的是「是否聲請者未被告或不瞭解應繳交該筆費用？」，另由裁決書中所言，有些聲請者被駁回係因通知繳費的信函未能送達至聲請人手中（地址有誤等因素而退件），以致未繳費而駁回的現象看來，似乎的確是有聲請者是在不知需繳費的情況而被駁回的（當然也許有些人是知道該繳費，但有其他因素的考量而不繳費的），因此，如何在聲請程序和訊息的傳遞上更周延、完整，維護案主「知後同意」的權益，可能是防治服務需思考的問題。

此外，由其他被駁回的理由（未及時

補正相關資料、聲請書中未具體載明，或證據的呈現等），亦多數是因為聲請者在聲請過程中的瑕疵以致保護令的審理和核發工作受到阻礙的現象看來，我們該思考的是這些瑕疵是如何產生的、如何增加聲請者【被害人、檢察官、警察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等】的聲請能力和對保護令審理工作的了解，以避免瑕疵的持續出現，可能是我們應正視的問題。

而由沈慶鴻（2003）的研究中，受訪者所表達的法院聲請經驗（聲請當時的緊張焦慮、法庭的程序過於繁雜複雜、在法院詢問相關資訊的挫折經驗等）及對保護令的不瞭解和陌生的心情看來，要在沒有人協助的狀況下，即提升聲請者的聲請能力和品質，似乎是不易達成的目標；因此受虐者在整個保護令的聲請過程中，可能仍是十分依賴相關網絡的工作者（警察、醫護或社工人員等專業人員）發揮專業能力，才能使得他們在過程中獲得清楚、完整的資訊，並掌握所有細節的；否則若急需保護令之聲請者是在未能清楚瞭解的狀況被剝奪權益的話，相信對所有參與暴力防治的工作者而言都會覺得相當的遺憾和可惜的。

另外，在法官的駁回理由中，亦可看到法官對施暴證據的重視，因此受虐者有無優勢的證據，能證明未來有繼續受暴的可能、能否舉證自己長期受暴等都影響法官審理工作的進行，而法官核發保護令與否時，係以有無具體的暴力攻擊事實做判斷，有愈多、愈具體明確的證據時，法官在做判斷上愈清楚、肯定，若無法呈現暴

力傷害的證據時，則愈難確定傷害的存在；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過，我們想要提醒的是：若完全以過去的暴力行為做為保護令核發與否的唯一要件，是否能準確的預測未來暴力發生的可能性？保護令的核發（不論禁止令、限制令、遠離令）應都是為了能夠預防未來的暴力行為，但法官只重視過去暴力攻擊的具體證據，而忽略未來暴力行為的推測，是否會讓某些因素無法具體呈現過去暴力證據之聲請案，忽略其未來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能否在兼顧過去暴力攻擊的事實和未來暴力攻擊的可能性之間取得平衡？是否有其他可行的參考指標？相信應是可以思考的議題；尤其保護令審理的程序法理中「不採嚴格證明程序而採自由心證程序」的精神，應即是強調保護令的審理「應以當事人平等主義、公開主義、言詞主義及直接主義等原則為基礎，考慮保護令事件之性質特殊，被害人往往蒐證能力不足，若貫徹嚴格證明程序原則，將使被害人不易受到應有的保護，故有緩和嚴格證明而寬認自由證明之必要」（沈方維，1999b），因此不單以暴力證據為唯一要素，應才是符合保護令之法理精神的做法。

而針對證據力的問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0）就曾在家暴防治之司法程序調查報告中表示「駁回率的高低與核發率，反映了不同法官對於保護令的態度及心證程度」，由於家暴法並未明定各款聲請事由的必要證據內容及證明力的情況下，法官心證成為唯一的證據標準，也就是說法官個人對各款事由心證的證據水平，將

會決定性的影響核發或駁回的結果；如果法官偏向於受暴防治，對於證據的要求條件會較寬鬆，保護令的核發率就會提高；相反地，若法官偏向於維護家庭完整的傳統價值，就會導致駁回率偏高，也使得受害人提出證據的難度提高。

而針對保護令駁回比率的問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0）亦表示「受暴者提出聲請會遭到法官駁回的機率，其實是高過顯性的駁回率表現的」，其主要的原因在於雖然駁回率是明顯可見的判斷標準，但是不可忽視「駁回率」中可能隱含了法官以聲請不可能通過，要求當事人撤回的比率，研究者（2003）的研究發現亦支持此一觀點，有部分的受訪者的確是在法官表示核發無望下，為不激怒相對人而撤回保護令的；周月清（2001）、柯麗評（2000）及李仰欽（2000）亦提出『被害人撤回案件的原因並非單純的「個人意願」，而是與被害人在聲請過程中和司法體系的互動經驗有關』的說法，皆與上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0）的說法相呼應。

因此我們相信，駁回和撤回其實是互有相關的，約 1/10 的駁回率和接近 1/4 的撤回率，在數字上應是相通的，因此若我們只單就駁回率的數字來分析，而認為撤回是個人的意向，故不需做更多瞭解的話，是不可能探究到更多隱含在數字下的意涵的，而司法院目前認為撤回是聲請人「個人意願」、而沒有必要進行探究的立場，實在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而根據陳殿輝（2001）的研究指出：被害人會因為安全因素、時效及法官不友善的態度而撤回保護令案件的結果，亦再

次說明了撤回動作並非單一因素促成的，除了法官的態度外，本研究歸納自少數有陳述撤回理由的檔案卷內發現：「已離婚、對方答應離婚或相對人答應某些條件（如搬出）」亦是撤回的主要原因，這與研究者（2001）的結果發現「希望透過撤回來表達善意，相對人能因此答應離婚、擔憂子女出庭、怕因出庭影響工作」等多重因素，而撤回保護令的做法是相吻合。

不過這個現象，更提醒我們的是保護令對許多受虐婦女而言，可能只是過程，離婚、脫離關係可能才是受虐婦女最終的期待，在覺得保護令沒多大功能、又害怕聲請保護令激怒配偶，而使配偶更不願意離婚的狀況下，受虐婦女則可能會在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的狀況下，選擇犧牲保護令（撤回保護令）而期待配偶答應離婚；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撤回」真能讓配偶實踐承諾嗎？如果配偶不履行承諾，那麼已經撤回保護令的受虐婦女又該怎麼辦呢？又如果撤回是受虐婦女自決下的結果，那麼婦女機構能在受虐婦女決定撤回時，提供何種可能的協助呢？雖然多數的婦女機構在保護令制度展開後，工作量均明顯增加，然而為服務保護令不同終結狀況的受虐者，婦女機構實有必要發展完善的結案和追蹤系統，掌握受虐者在服務階段中的動態，如此才能確實評估服務之成效。

保護令推動至今，多數人都將焦點關注於核發率上，但對撤回和駁回的了解則普遍不足，殊不知法官如果無法在保障被告人權與保護被害人之間取得平衡，給予被害人充分的保障和支持的話，被害人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而再次受害的社會成本

將持續累積，法官的工作量亦不會因為一次的案件撤回而降低，這些亦只是徒增司法資源的循環浪費而已。
（本文作者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 參考文獻

- 王秋嵐（2001）警察與社工員對緊急性暫時保護令聲請作業實況初探－以臺北市為例，90年婦女人身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VII1～VII22。
- 李仰欽（2001）家庭暴力防治法民事保護令實施之現況討論，90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內政部指導：臺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主辦，1－22
- 沈方維（1999a）民事保護令運作模式之我見（下），司法週刊，933，2－3。
- 沈方維（1999b）民事保護令事件之性質及其程序法理初探，全國律師，7月號，6－15。
- 沈慶鴻（2001）保護制度之實施對臺北市受虐婦女處境影響之探討，臺北市政府90年專題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沈慶鴻（2003）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保護令聲請經驗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24，169－206。
- 周月清（1997）臺北市婚姻暴力防治體系之研究－現況及需求之評估，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
- 洪遠亮（2000）回應民事保護令部分問題。律師雜誌，248，72－106。
- 柯麗評（2000）保護令真的保護了遭受虐待的婦女嗎？律師雜誌，248，58－71。
-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0）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週年－司法程序調查報告，司法改革雜誌，28，30－34。
- 高鳳仙（1996）家庭暴力法規之保護令探究（上），司法週刊，780，3。
- 許瑞助（2000）談保護令之執行，全國律師，4:11，15－21。
- 陳殿輝（2001）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規範及其實施現況檢討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司法院網站（<http://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